

中国环境社会学十年回眸

顾金土 邓 玲 吴金芳 李 琦 杨贺春

(河海大学 社会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中国环境社会学已有近 30 年的发展历史。经过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积累,中国环境社会学在 21 世纪前 10 年里在学科定位、学术成果、组织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学科定位表现在对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等方面的进展。学术成果突出表现在环境污染的社会成因分析、城乡居民的环境意识和受害者的环境抗争领域。组织建设体现在 3 家较为稳定的学术机构、3 次大型学术会议、频繁的国际交流和可观的人才培养。今后的中国环境社会学将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环境社会学 学科定位 组织建设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11)02-0029-07

环境社会学诞生的标志是 1975 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成立环境社会学分会。从此,社会学界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环境社会学的使命就是从社会学视角研究环境问题的内在机理,为协调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中国环境社会学^①也不例外。中国环境社会学早期遵循两种路径:一是社会科学家受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促动自发展开研究;二是翻译、介绍国外环境社会学的学术成果。随着环境社会学学科的日渐成熟,两种路径已经相互交融,共同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特别是最近 10 年,在组织建设、科研成果以及学科探索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回顾这段不长的历史,既可以梳理当代学术研究的点滴进步,又可以引起同行思索今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和走向。

一、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定位

中国环境社会学还只是一门建构中的学科^[1]。中国环境社会学还需要成长,需要在关键问题上寻找、确定与别的社会学分支的特殊性。下面首先简要回顾一下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历程,然后梳理中国环境社会学的方法论,最后陈述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涉及研究角度。

1. 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环境社会学大致经历 3 个阶段:一是 20 世纪 80 年代,零星介绍西方环境社会学的概念、研究

领域和学术信息,当时没有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学科意识^[1];二是 20 世纪 90 年代,系统介绍西方环境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出现针对本土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和国内学者编写的环境社会学教材,组织成立了一家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即中国社会学学会人口与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三是 21 世纪 10 年代,环境社会学在科研成果、组织建设和人才培养上进入了一个正规、有序、成规模的阶段。组织建设和人才培养情况见本文第五部分。这里以科研成果为例加以说明。根据国家图书馆的目录统计,2000 年之前,国内学者没有以环境社会学为主题的著作,2000 年之后,国内以环境社会学为题的著作有 12 本(译著不计),其中 7 本教材,1 本论文集,4 本专著。在论文方面,根据中国期刊网以“环境”或“生态”或“污染”加“社会学”为主题词,剔除重复部分,统计得到:2000 年以前,我国学者只发表了 15 篇学术论文,2000 年之后,共计发表 155 篇,其中前 5 年共发表 34 篇,后 5 年发表 121 篇,呈逐年递增态势。

2. 环境社会学的方法论

环境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继承了常规的社会学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但是,作为一门交叉性、应用性和利益敏感性的学科,它在方法论上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 4 个方面。

(1) 立足环境公平

客观公正是任何科学应该遵循的原则。对于环

收稿日期: 2011-04-21

基金项目: 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2009B24714)

作者简介: 顾金土(1974—),男,浙江上虞人,副教授,博士,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

① 本文所指的中国环境社会学只限于内地,以年代作为划分依据,而不采用标志性事件,部分内容也可能超出过去 10 年的范围。

境社会学来说,追求环境公平尤为重要。洪大用认为,环境公平是指人人享受清洁环境和环境破坏责任与环境保护义务相对称^[2],是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最佳切入点和链接点^[3]。采用环境公平视角,研究者就会从单纯关注环境状况转而关注社会的结构调整。中国的环境资源分配有失公平,处于中上层的强势的城市居民和企业主阶层把环境污染的社会代价转嫁给处于底层的农村居民,从而形成了环境分配的“马太效应”^[4]。以改善环境为使命的社会学者,应该站在污染受害者的立场,研究让倾斜的天平实现均衡的社会机制。

(2) 秉持开放视野

环境问题需要跨学科研究。实证取向的环境社会学只有包容环境科学、环境哲学、环境经济学、环境政治学、环境法学和环境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才能科学确定污染—损害—治理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社会承受能力前提下的环境治理责任,才能为不分学科的环境问题贡献力量。“具体详细地做归因分析,不是我们(社会学家)能够做到的,而是有赖于医学研究者、化学和环境学的研究者。”^[5]我们还需要向国外同行开放。因为环境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问题,我们需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借鉴国际环境社会学的学术成果,避免学术弯路,为我国环境恶化趋势的尽早逆转贡献良方。

(3) 回应本土需求

中国环境社会学应该充分体现本土性。这有两层意义。一是在理论层面要重视“理论自觉”。环境问题在不同文化与社会中有不同的具体原因,也会有不同的社会影响和解决路径^[6]。中国环境社会学者要在经验研究中保持理论的敏感性,注重揭示经验背后的理论意义,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的环境社会学理论,而是在理解、把握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特殊的社会现状之后进行理论创新^[7]。二是在实践层面要直接面对现实的环境污染或危机。中国的地区性差异很大,环境问题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形式也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习,多做一些环境问题的经验研究,从一个个经验事实中积累出中观层次的理论^[8]。

(4) 承担历史责任

环境问题伴随人类生命的始终。当前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十分严重,需要我们持续、密集地加以关注和研究。只有从长期的历史变迁的角度来考察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问题,才能更为有效地看到环境问题的本质、复杂性,看到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在信息化、符号化发达的时代,环境问题很容易被其他问题掩盖或遮蔽掉,需要有一股强

大的力量,使环境问题始终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这样才能形成持久的压力,迫使政府、企业以及每一个社会成员去行动^[5]。作为环境社会学学者,只有深入环境问题现场,直接接触环境受害者,才能切实感受环境问题的迫切性和复杂性,也才有可能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治理办法,实现一门学科对于社会的使命。

3. 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3类:环境问题、环境行为和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国学者并没有陷于“环境问题的社会学”与“环境的社会学”之间的对象纷争,也没有陷于关于环境问题的经验主义(以美国学者为主)和社会建构主义(以欧陆学者为主)之间的流派争论。大家公认,环境社会学既要研究环境与社会关系,也要研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等现实问题,考察其形成的社会影响因素及所导致的社会后果,并寻求应对策略^[9]。在具体侧重上,各研究者有所不同,如唐国建、崔凤侧重环境行为及其可选择性问题^[10],左玉辉侧重调控人类环境行为的社会手段和途径^[11]。

已有研究成果涉及环境污染的社会成因、城乡居民的环境意识、受害者的环境抗争、环境公平(正义)、环境教育、环境权利、环境运动、环境群体性事件、生态移民、草原保护、海洋环境、城市垃圾处理、环境政策、环保组织与公共意识、学科建设和发展等领域。总的来说,中国环境社会学在理论方面主要是对已有研究范式进行归纳和总结,还没能提出新的研究范式,也尚未形成独特、成熟的理论体系。相比较而言,学者们在前面3个领域取得了较为丰厚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重要概念和命题。下面逐一论述。

二、环境污染的社会成因分析

环境污染的社会成因分析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学者对于环境污染的研究着眼于整体分析。麻国庆认为,环境问题主要原因是农民小生产者功利性的短期行为和缺乏严格监督管理的乡镇企业^[12]。卢淑华认为,本溪市污染严重的原因是城市功能区不分,污染的受害者与其拥有权力有关,组织或个人权力资源与环境价值存在交换关系^[13]。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术积累之后,中国环境社会学在21世纪的头10年中显露出学术成绩。

洪大用首先研究了中国环境污染的3种转移:污染产业从国际向国内转移,在国内的城乡转移和从先发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14]。随后,他运用社会转型理论解释中国的“环境衰退”,具体从工业化、

城市化、区域分化、市场经济体制、放权让利改革、二元控制体系、道德滑坡、消费主义、行为短期化等多方面论述了中国环境衰退的社会结构因素^[15]。

陈阿江系统地研究了农村的水污染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解释性概念。首先是“生态失衡”。传统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方式与水域环境相平衡,而现代的农村基层组织的行政化、传统伦理规范和自治组织的消亡,破坏了这种平衡,结果是周围水域被迅速污染^[16]。其次是农村也面临严重的内生污染。来自村落外部的城市污染、地方工业污染等“外源污染”下乡,导致水的高级功能丧失,村民被迫转而利用水的低级功能,村民角色也从传统的保护者转变为污染者^[17]123-131。这种局面的内在机制是一种“次生焦虑”。“次生焦虑”是人们面对现代化的强大压力而在社会文化心理上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焦虑^[17]186-187。因此,水污染的治理应从目前技术主导的研究和治理措施转为技术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和综合治理^[17]230-232,让环境污染者内在地产生“生态利益自觉”^[18],实现人与环境的“生态转型”,取得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三者的关系呈现良性互动的多赢态势^[19]。

中国环境污染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城市好转,农村恶化”。这是怎么造成的?张玉林、顾金土通过大量的农村个案研究发现:农业和农村环境污染不仅带来了巨额的直接经济损失,而且严重破坏了一些农村地区的生态和生活环境,对农民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威胁,危及农民的生存;环境污染以“暴力”的形式正在逐步地、以隐蔽或公开的方式对中国乡村进行着系统的破坏和颠覆,在局势短期内并不会好转的大趋势下,环境污染这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将使“三农问题”变成越来越难解的“中国结”^[20]。结果是,农民成为承担环境污染责任的主体,环境污染问题也成为农民的最大负担。

环境破坏也可以视为一种“理性的困境”。“理性的困境”是王芳在分析社区环境破坏时创设的概念。她认为,环境的公共性是环境问题的要害。环境问题究其实质,正是由于社会行动者从个体利益出发引起的环境行为失当而造成的公共空间的环境破坏,这是相关行动者一系列个体理性行为的博弈构建出的一个集体非理性的结果。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构成了理性的困境,导致了环境问题的产生^[21]。在社区环境建设中,如何突破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对立,让个体行动与社区目标内在地结合起来,是一个令人兴奋也是任务艰巨的学术课题。

社会学擅长角色分析,利益相关者分析是研究现实环境问题的基本方法。环境污染的背后就是人

们经济利益或环境权利之争,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环境污染破坏了相邻社会主体原有的利益平衡关系,引起了环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竞争或冲突。环境污染也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竞争或冲突的外部牺牲品。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学者可以正确分析污染事件中各方的态度、行为是有效实现法律与政策调控和环境教育的基础性认知,进一步探讨环境污染过程的内在发生机制^[22]。

三、城乡居民的环境意识研究

环境意识也是环境社会学领域中的热门话题。国内已经开展了多项环境意识的实证研究。洪大用率先从事环境意识的调查和研究。他将环境意识分解为环境知识、基本价值观念、环境保护态度和环境保护行为4个维度13项指标。1995年对全国3662个城乡居民调查发现,我国城乡居民总体平均得分只有44.13分(满分为100分),整体环境意识水平不容乐观^[23]。也有学者发现,中国的环境意识存在4种形态,即学术形态、政府形态、大众形态和未来形态,分别代表知识分子、国家行政人员、城市居民和学生^[24]。马戎等根据1996和1997年中国环境调查数据发现,城乡居民在环境意识和环保态度方面差异明显^[25]。洪大用进一步研究了环境意识概念的3个维度,即人类中心倾向与环境中心倾向、物质主义倾向与后物质主义倾向和浅层环境意识与深层环境意识。调查发现,我国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在整体上还是偏向物质主义和浅层次的^[26]。王芳等通过调研发现,上海市民环境意识总体水平不高,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呈典型的“自我保护型”,环境意识与行为相脱节^[27]。

随着思考 and 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也开始与国际研究进行平等对话。在设计量表的过程中,洪大用教授发现环境意识的复杂性。他经过梳理发现,环境关心(环境意识的重要部分)可以区分为两个大的类型:一是针对具体环境问题的环境关心,二是针对综合性环境问题的环境关心。他借此修订了Riley E. Dunlap的“新环境范式”量表(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简称NEP),并应用于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城市部分)。结果发现,照搬修订过的NEP量表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删除其第4项和第14项,只保留剩下的13个项目^[28]。在对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后续分析中,卢春天、洪大用进一步印证了环境关心是一种复杂组合,包括了对当地和全球环境问题认知、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取舍以及对新生态主义范式世界观的认同。环境关心各因子的相关性并非趋于同一个方

向,而且彼此相关强度也不一致,环境关心不是一个有着内在一致性的态度体系^[29]。

性别分析一直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环境意识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存在怎样的差别?张世秋等人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妇女的环保意识水平和对环境保护的参与水平较低,妇女的环境意识存在二元结构,对日常生活的环境具有较高的关注程度与意识水平,而对于远离日常生活的生态环境,关注与意识水平不足^[30]。胡玉坤认为,环境意识方面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妇女的环境意识是由特定地理情境下妇女的生活经历,主要源自其社会位置和社会性别角色的折射,而不是由某些本质化的妇女同自然的密切关系塑就的^[31]。与此相反,洪大用、肖晨阳认为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存在性别差异,男性比女性具有更高水平的环境关心,而不是相反。性别对于环境关心的影响是通过环境知识这一中介变量发生的,受到社会化过程与社会结构位置的影响^[32]。龚文娟等也赞成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和环境友好行为存在性别差异,抽象环境关心水平男性高于女性,但实际的环境友好行为比例男性却低于女性;在私人领域内的环境友好行为比例女性高于男性,相比私人环境友好行为而言,男女的公共环境友好行为比例都很低^[33]。总体来看,大部分研究者赞成环境意识和行为存在性别差异。

国内环境社会学者对环境意识研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研究方法较为薄弱,绝大多数研究只是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缺乏对数据的细致解释和推断,少数解释的主观倾向较为明显,研究深度不足;二是测量工具有待规范化和本土化,导致结果的可信度不高,测量结果相互打架的现象时有发生;三是关注点多集中在环境意识方面,对于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相结合开展的相关研究很少,降低了环境意识研究的意义。

四、环境受害者的抗争研究

从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角度,人类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环境保护行为;二是环境破坏行为。前者可能是保护自己私利过程中的副产品,也可能是与自己没有直接关联的公益行为;后者是环境致害者的行动。环境致害者破坏环境之后,共同使用环境的其他人的权利就会受到侵害,他们就是环境受害者。环境受害者为了维护环境权益(包括因环境破坏而导致的经济、身体损害),而向环境致害者和监管者展开环境抗争。这种抗争其实是一种社会冲突,也可以称作环境冲突或者环境纠纷。根据目前的污染转移趋势,环境受害者往往是贫困地区的弱

势群体。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环境地位决定其抗争行为往往费时、费力和费钱。这是不公平的,但又是社会转型期的典型事实。这既为环境社会学者提供了丰富、动人心弦而带苦涩的绝佳素材,也为一项项优秀的社会学成果提供可能。

童志锋研究发现,从1949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环境抗争主要迫于政治压力或经济压力,环境抗争问题化不明显,抗争方式温和,抗争主题单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环境抗争事件增长迅速,环境抗争问题化趋势明显,抗争主题多样化,抗争规模增大,抗争对象扩大。期间,网络在城市居民的抗争中作用明显,但抗争组织化程度仍然不高^[34]。

张玉林使用“政经一体化”的概念分析了农村环境污染所引发的社会冲突。环境冲突的加剧与政经一体化的增长推进机制有着重要关系,地方官员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任期考核指标的压力型行政体制下,将GDP和税收/财源的增长作为优先选择,从而导致了重增长、轻环保的污染保护主义倾向,受害农民难以获得被补偿的权利,因此围绕污染而生的纠纷也在不断升级^[35]。因为农村的污染受害者组织化程度低,缺少外部精英支持,当面对高度组织的企业和不受约束的公共权力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不仅环境抗争很难取得成功,而且抗争者容易遭受进一步的伤害。城市污染的减轻以及城市环境抗争的逐步胜利意味着农村环境污染的加重以及农村环境抗争将更加举步维艰^[36]。

哪些人往往成为环境抗争者?冯仕政通过定量分析发现,中国城镇居民面对环境危害时的行为反应受差序格局的影响,即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越大或势力越强,关系网络的疏通能力越强,对环境危害作出抗争的可能性就越高,大多数人在遭受环境危害后之所以选择沉默,是因为他们缺乏通过抗争来维护自己权利所需要的资源^[37]。陈阿江在研究水污染问题时也发现,普通百姓为了基本的生存,面对专业壁垒和强势的企业、政府,无奈选择沉默,仅有“傻子”、“疯子”还在抗争^[22]。在对抗污染企业时,农村环境抗争的阻力有:环境利益获得者和环境损害承担者的分离,地方政府对短期经济增长的需求,地方环保部门和司法部门不独立,村民没有实质的话语权和监督权等^[38]。

与其他学者强调环境抗争的经济理性不同,景军强调文化因素对环境抗争的影响。他以一个西北乡村为例,发现宗教、宗族等地方文化在动员人们参与抗争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核心作用,村民在环境抗争过程中需要经历认知革命,而生态环境逆转也

需要认知革命和文化自觉^[39]。生态认知革命主要是指人们在新型信息的基础上对某一既有的自然生态产生出全新的并有突破性的认识;生态文化自觉主要指生活在某一文化中的人们对其文化产生的“自知之明”,明白其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由此而加强自身在新时代、新环境下进行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这两个理念集中体现了文化因素在动员人们参与环境抗争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39]。

环境抗争容易诱发群体性事件。环境群体性事件具有发展形势严峻、预警较易、参与者诉求多样化、地域不确定等特点^[40]。解决或防止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有什么样的环境理念、如何对待民众的环境诉求、如何处置民众的自救维权行为。如果政府奉行“污染保护主义”的思想,企业的排污和侵害行为得不到公共权力的有效制止,公众只能选择“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那么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环境抗争也可能采取非对抗的方式。在厦门市反建PX项目的案例中,市民联合科学家、时评作家、媒体等精英或机构,经历了一个“从制度外的或对抗性的政治行动演变为公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的过程,最终促使政府态度发生转变乃至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41]。生态移民是另一种非对抗的环境抗争,是人与环境关系由对抗变为保护。生态移民牵扯到民众的当前经济利益和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等一系列问题^[42]。生态移民政策延续了中国的“危机应对”和“政府直控”的特点,其实践过程也是由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精英、农牧民等多元社会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其中地方政府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于一身,是各种关系的连接点,给环境保护目标带来了不确定性^[43]。

环境抗争研究的优点是实证性,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其不足之处是:缺乏从个案到一般的进一步拓展,抗争原因分析多侧重于经济、政策因素,文化和社会因素考虑较少。环境抗争研究应该与环境正义相结合。水往低处流,如果没有人为矫正,污水也是往低处流的,这符合自然法,但不符合环境正义。环境正义要求“谁污染、谁治理”。资本向利润高处流动,这符合经济理性,但也不一定符合社会正义。社会正义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实的环境问题既体现环境非正义也体现了社会非正义。健康环境往往被强者取得,而环境污染往往落在弱者身

边或身上。工业污染是商品的附属物,生活污染是商品的衍生物。原本一体的事物却由两个独立的主体承担,使得环境不公正成为社会不公正的加速器。因此,中国环境社会学是逆自然法、逆经济规律(指非法排污者)、逆政治规律(指追求短期政绩者)的一种理论和实践创新。

五、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组织建设和人才培养

中国环境社会学在不长的时间里在学术机构、学术会议、国际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国内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机构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国际交流日渐频繁,学术成果越来越精深、厚重,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有较大提升。

1. 学术机构建设

目前已经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其前身是成立于1992年7月的人口与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是中国社会学会的二级学会,2009年7月改名)。该专业委员会挂靠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社会学院,现有60位理事会员,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以社会学者为主体的环境社会学研究组织。到目前为止,全国已创立3家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机构^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成立于2007年,是研究农村环境与社会问题的机构,成员主要是具有社会学、环境科学、农村发展与管理等专业背景的专职研究人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变化与当地居民贫困、环青藏高原草原牧区的环境变化与牧民生计、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和产权制度安排、农村环境污染和惠及穷人的农村发展等4个方向,注重理论与政策的结合。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社会学研究所,成立于2009年4月,是内地第一家环境社会学研究所。该所的重要特色是开展环境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建设。其研究人员在社会发展与环境关系、企业环境责任、面源污染、环境意识、环境抗争、环境社会学方法论以及理论建设、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等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该所还多次承办国内、国际大型环境社会学会议,为我国环境社会学界提供了良好的学术交往和国际交流平台。

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成立于2010年8月,以河海大学社会学系为主体,联合环境法研究所、水环境研究所等机构,共同致力于环境问题的机

① 机构介绍来自其官方网站或者学术期刊信息。

理研究和对策分析。该中心主要研究方向是开展环境问题、特别是水污染问题的实地调查与理论研究,研究环境问题的社会学机理。该机构既注重学术研究,也积极为政府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的水土保持、污染治理等发展项目提供决策咨询。

2. 学术交流频繁

到目前为止,国内举办过3次大型环境社会学术会议。一是2006年11月11~1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主题是“中国环境状况与环境社会学的发展”,涉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与环境恶化、区域性环境问题的社会学分析、公众环境意识与维权行为、公共参与和非政府环保组织的发展作用、环境政策及其执行过程的社会学分析、环境社会学理论发展等内容^[44]。二是在2007年6月30日至7月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内地、美国、加拿大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会议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中国环境状况,探讨环境治理的对策和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建设。三是2009年4月25~26日在河海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7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水·环境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主题,讨论了环境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环境与资源、人—水和谐机制、环境行动和环境移民与环境治理等主题。我国学者还积极参与筹办了“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研讨会”,先后参加在日本东京法政大学(2008年)和台湾清华大学(2009年)举办的会议,并商定定期举办东亚地区环境社会学者之间的交流会议,共同推进东亚地区环境社会学界交流对话的制度化建设^[7]。

许多国际著名的环境社会学家应邀来华讲学,如中国人民大学邀请了Riley Dunlap、Raymond Murphy、William Freudenburg、Arthur Mol等著名教授;河海大学邀请日本环境社会学学会前会长、早稻田大学鸟越皓之教授、台湾清华大学王俊秀教授等。还有许多国内教师和学生去国外访问、讲学或攻读学位。另外,国际环境社会学著作也陆续翻译到中国内地,如查尔斯·哈珀的《环境与社会——环境问题中的人文视野》、迈克尔·贝尔的《环境社会学的邀请》、安东尼·吉登斯的《气候变化的政治》、汉尼根的《环境社会学》(第二版)、鸟越皓之的《环境社会学——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思考》等。这些学者的到来和学术著作的传递,开拓了中国环境社会学学者的视野。

3. 人才培养已经起步

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河海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多所高校已经开设了环境社会学课程,招收环境社会学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其中河海大学社会学系、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把环境社会学作为社会学学科的一个重要方向。自从1999年洪大用首篇以环境社会学为主题的博士论文之后,2000年之后数量明显增加。根据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数据库,我们在社会学专业范围内以“环境”或“生态”或“污染”为主题词加以检索发现:2000年之后的前5年相关论文还比较少见,但是从2006年开始,硕士学位论文数量有较为稳定的增长,5年共计42篇,而博士学位论文同期也有11篇。这标志着,环境社会学已经成为社会学界青年学子所感兴趣的课题,将催生新的学术思路和成果,共同推进中国环境社会学的成长。

六、结 语

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环境社会学在学理探索、学科培育、组织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今后的系统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展望未来,环境社会学者的任务依然艰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环境与社会二元视角进行有中国自身特点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创新;二是承担起扭转中国环境恶化趋势的公共责任。前者要求环境社会学者敞开学科视野,包容天文、地理、历史、环境科技、生态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一支精干而有活力的团队更为适合),静心研究,寻找能够适合解释中国环境变迁和社会变迁的理论范式;后者要求学者走出书斋或实验室,将前者所得的理论知识、命题和对策方案付诸于改善环境质量的实践,既获得学术的验证,又获得学术创新的来源。在成功实现经济转型之后,社会转型和环境转型成为当下中国的最重要使命和挑战。二者相互之间的缠绕关系,给具有环境与社会二元视角的环境社会学以最好的发展机会。中国的环境社会学者应该辛勤耕耘,也值得为此努力。

参考文献:

- [1] 洪大用. 中国环境社会学:一门建构中的学科[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 [2] 洪大用. 当代中国环境公平问题的三种表现[J]. 江苏社会科学, 2001(3): 39-43.
- [3] 洪大用. 环境公平: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观点[J]. 浙江学刊, 2001(4): 67-73.
- [4] 王书明. 生存权、环境权与社会排斥的底线:环境正义经验研究的社会学视角[M]//徐祥民. 中国环境资源法学

- 评论(2007年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31.
- [5] 环境保护与环境抗争:张玉林教授访谈录[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3(2):23-26.
- [6] 积极推进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洪大用教授访谈录[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3(2):11-16.
- [7] 洪大用.理论自觉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3):109-116.
- [8] 环境社会学的学科理念和研究方法:包智明教授访谈录[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3(2):20-23.
- [9] 林兵.中国环境问题的理论关照:一种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视角[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3):117-122.
- [10] 唐国建,崔凤.论人类的环境行为及其可选择性:基于环境社会学学科定位的思考[J].学习与探索,2010(6):108-110.
- [11] 左玉辉.环境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
- [12] 麻国庆.环境研究的社会文化观[J].社会学研究,1993(5):44-49.
- [13] 卢淑华.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本溪市的环境污染与居民的区位分布[J].社会学研究,1994(6):32-40.
- [14] 洪大用.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八大社会特征[J].教学与研究,1999(8):11-17.
- [15] 洪大用.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6.
- [16] 陈阿江.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62-69.
- [17] 陈阿江.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18] 陈阿江.论人水和谐[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0(4):19-25.
- [19] 陈阿江.再论人水和谐[J].江苏社会科学,2009(4):70-75.
- [20] 张玉林,顾金土.环境污染背景下的“三农问题”[J].战略与管理,2003(3):63-70.
- [21] 王芳.理性的困境:转型期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探析:环境行为的一种视角[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6-10.
- [22] 陈阿江.水污染事件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J].浙江学刊,2008(4):169-175.
- [23] 洪大用.公民环境意识的综合评判及抽样分析[J].科技导报,1998(9):13-16.
- [24] 王民.试论环境意识不同表现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J].环境导报,2000(2):9-11.
- [25] 马戎,郭建如.中国居民在环境意识与环保态度方面的城乡差异[J].社会科学战线,2000(1):201-210.
- [26] 洪大用.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J].江苏社会科学,2005(1):127-132.
- [27] 王芳,杨雄.上海市民的环境意识: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11.
- [28] 洪大用.环境关心的测量:NEP量表在中国的应用评估[J].社会,2006(5):71-92.
- [29] 卢春天,洪大用.建构环境关心的测量模型基于200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J].社会,2011(1):35-50.
- [30] 张世秋,胡敏,胡守丽,许士玉.中国小城市妇女的环境意识与消费选择[J].中国软科学,2000(5):12-16.
- [31] 胡玉坤.情境化的探讨:对社会性别与环境互动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1(5):45-53.
- [32] 洪大用,肖晨阳.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7(2):111-135.
- [33] 龚文娟,雷俊.中国城市居民环境关心及环境友好行为的性别差异[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340-345.
- [34] 童志锋.历程与特点:社会转型期下的环境抗争研究[J].甘肃理论学刊,2008(6):85-90.
- [35] 张玉林.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与中国农村的环境冲突[J].探索与争鸣,2006(5):26-28.
- [36] 张玉林.环境抗争的中国经验[J].学海,2010(2):66-68.
- [37] 冯仕政.沉默的大多数:差序格局与环境抗争[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122-132.
- [38] 罗亚娟.环境社会学视角下的环境污染问题[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0(4):34-37.
- [39] 景军.认知与自觉:一个西北乡村的环境抗争[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5-14.
- [40] 程雨燕.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其法律对策[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7(2):46-49.
- [41] 张虎彪.环境维权的合法性困境及其超越:以厦门PX事件为例[J].兰州学刊,2010(9):115-118.
- [42] 包智明,孟琳琳.生态移民对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内蒙古正蓝旗敖力克嘎查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05(2):147-164.
- [43] 荀丽丽,包智明.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及其地方实践:关于内蒙古S旗生态移民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7(5):114-128.
- [44] 龚文娟.2006年“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综述”[J].社会科学辑刊,2007(1):259-261.